

從反共的道統論到國族主義的轉型：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05-0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張, 中復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4945/00010097">https://doi.org/10.14945/00010097</a>

# 從反共的道統論到國族主義的轉型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

From Anti-Communism Legitimac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The Chinese Culture Revival Movement in Taiwan

張中復

Chang Chung-fu

台灣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摘要

1966年爆發的文革雖然導源於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但其後所引發的紅衛兵等群眾路線運動，以及澈底反傳統的「破四舊」革命思想的橫行，讓傳統中國文化蒙受極大的破壞。在台灣以反共復國為主要國策的中華民國政府則藉此機會，於1967年初正式開使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國民黨的反共道統論、中國文化祖國論轉化為具體的文化復振措施，企圖突顯其為中華正統文化捍衛者的地位，以強化對抗中共的政治資本。就實施成效而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可以看作是一種現代民主國家展現其文明建設觀的嘗試，同時某種意義上也使得台灣成為華人世界裡尊重與保持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地區。但該運動「寓文化力量於政治」的基本理念，以及藉由黨政運作和教育宣傳下，來激化民主自由對抗共產極權意識形態的對立性，都讓這種文化復興的內涵不是受限於「忠君愛國」式的偏執主觀性，就是陷入「與匪鬥爭」抗爭式的敵我觀。尤其在1970年代初，台灣面對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後，將「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思想意識與正在推動的文化復振措施結合，這都讓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過度強調定型式的崇高理想，以致欠缺整體復興中華文化在兩岸不對等的環境中所能展現的實際效應。就本質看來，在戒嚴體制、管控思想的大環境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明顯缺乏思想活絡下具有深度意義的啟蒙性功能，因此只能成為依附在政治目標下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自我保衛運動。另一方面，因為該運動推動同時明顯壓制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與定位，所以便使得日後台灣內部的國族主義走向與國家認同觀，在民主化及其本土族群動員的推波助瀾下，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相關的文化政策，視為國民黨削弱台灣主體文化意識的推力。這對於之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出現「保中」與「去中」的思想對立，以及國家認同分裂下的國族主義思想爭議性，都產生著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 文革、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復會、道統論、國族主義

## 一、緒論

無論從內戰的延續或二次大戰後冷戰的展開，1949年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在「全球反共」的陣營中，積極扮演著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此一抗爭型態背後雖然是美國西太平洋反共防堵策略中的一環，但中華民國政府在凍結其1947年剛制定完成的憲法、且以〈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令〉取代之，並開展一系列的集權統治政策。做為唯一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不僅將「反攻大陸」視為國策與強化政治意識型態的主軸，同時也不斷強調其對於整個中國主權與領土的統治正當性（包括已於1949年實質獨立的外蒙古）。另一方面，台灣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也將「解放台灣」、結束內戰，終結其宿敵國民黨在中國統治的事實，視為其政治軍事方案中的首要目標。這種近三十年瀕臨全面戰爭邊緣的對抗與緊張態勢，一直到1978中共年11屆3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以及1987年台灣宣佈解嚴後，才開始逐漸和緩。從這一點看來，台灣在政治、軍事與意識形態上直接與中共抗爭的經驗，在當時的反共陣營中可以說是相當積極且具有代表性的。而且與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等分裂國家的形式不同，蔣介石與國民黨一直反對用此一模式來處理兩岸局勢與相關的國際議題。而中共也直接把台灣問題視為內戰延續下其領土主權訴求中的一省，至今還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具有國際法上的主權（sovereign）事實。的這一點不僅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上世紀中期的尖銳對立不斷升高，同時也意味著中共政治軍事動向與內政變革所產生的變化及衝擊，對於台灣的影響也是最直接也最為敏感的。所以當1966年文革爆發、及其所引發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反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為後，台灣當局立即採取多項積極的政治因應措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把其視為代表中國法統延續象徵的「反共道統論」加以擴大論述，並開始全面推動持續多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企圖在對中共政治文化與自我宣傳的抗衡中重新取得新的制高點。

文革的起因固然與中共權力路線鬥爭息息相關，但不久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與所謂的造反派的實踐力量，很快便匯集成前所未有的群眾動員。這種激情式的動員，明確建立對立面，強調「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sup>1)</sup>，所以像所有其他群眾運動一樣，「寧左勿右」之風大行，而在造反與批鬥過程中表露出來的革命暴力，更不免趨於極端。尤其因文革要徹底產除的「四舊」，即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與舊習慣，並無明確定義，容許各種各樣的解釋。就像政策與口號下的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也無確切界說，容許挾帶個人或公或私、或好或壞的願意，加上群眾運動的從眾性與脫序性的激情，因此讓這場政治運動所帶來的文化破壞現象，超過以往認何可能達到的想像程度。另一方面，為了從意識形態方面改造和重組官僚系統，毛澤東以其個人聲望發動

---

<sup>1)</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收入：《對匪黨中央、軍委及偽國務院關於文革重要指示彙編》，台北：國家安全局，1967，頁17-18。

學生來從事革命，發動紅衛兵來打倒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和文教宣傳機構中的黨官僚。其結果一方面是毛個人成為壟斷一切知識的思想導師，另一方面則是正常的學術和教育活動被迫完全停頓<sup>2)</sup>。針對中國大陸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傳統文化延續與當代文化發展的所有機制都面臨停滯斷裂的情勢，而以「正統中華」地位自居的台灣國民政府，必然會以直接反擊的策略來予以回應。除之前已提及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外，1968年將全台灣國民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的政策，也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因應性措施<sup>3)</sup>。

台灣推動並擴大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另一個動力，是隨著1973年中共「十大」前後所展開的「批孔揚秦」運動，以及1974年初毛澤東擴大為對林彪批鬥的「批林」運動，其先後對像是以林彪等政敵為核心，或藉以達到牽制周恩來的策略。但「批孔」的思維及其藉文革而擴大的情勢，卻觸及到國民政府反共道統論及其以捍衛儒家思想的政治正當性，這自然會讓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展與執行更為積極。然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形式上固然強化反共的道統論及其鞏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同時某種意義上也使得台灣成為華人世界裡尊重與保持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地區。但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及其所倚重的國族主義畢竟與中國主要的整體環境脫離太久，所以在1980年代開始的本土主義勢力抬頭的權力競爭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意義下所標榜的中國國族主義，及其所代表的正統性反而成為像失根的蘭花一樣，成為本土派攻擊的目標。在隨後本土獨派意識萌芽及其後續爭奪權力的行動過程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理想性及其意識形態便不斷受到攻擊與制約，最終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及其奉行者欲取而代之的標靶。但在台灣一些繼續遵行中華文化主體性與中國國族主義的人的眼中，這種取代是絕對不能予以妥協的。這也因此引發了台灣內部日益激化的國族認同分裂與社會對立，直到今日也尚未看到有趨於和緩之可能。這應是當年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者所始料未及的一個結果。

## 二、捍衛反共道統論的正當性與及其對中共反傳統的批判

國民黨將中國的道統論，及其所代表的歷史統治延續的正當性予以合理化的闡述，應以孫中山思想為其開端。為在政治意識上突顯中華民國及其共和體制是中國歷史正統朝代嬗遞下的現代性產物，孫中山以其對宋明理學的認知與對儒家文化傳承的肯定，曾強調中國的道統是從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到孔子相繼不絕，而他的思想基礎與革命志業就是要闡揚接續這個道統<sup>4)</sup>。在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

<sup>2)</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下冊，頁798、851。

<sup>3)</sup> 參看：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九年國民教育籌備工作及其主體計畫之實施》，台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73。

<sup>4)</sup> 蔣中正，〈國父一百晉一誕辰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1966年11月12日），資料來源：陽明山中

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說「融會古今，貫通中外，不僅樹革命之理論基礎，而立國之根本大道，亦於是完成。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sup>5)</sup> 但其依附儒家思想的道統論，來襯托其革命思想的繼承脈絡則頗為牽強。一方面孫中山深受明代理學，尤其是王陽明學說的影響，但道統論也一直受到陸九淵等人的批判，其未必受到遵行儒學治國理念者的肯定。尤其道統論的背後，深受中國傳統史學對於以「正統」概念來做為秉持朝代循環以及統治正當性定位依據的影響，故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成為傳統史學在西學影響下備受攻擊的焦點之一。例如，梁啟超在其《新史學》中就毫不客氣地說，傳統史學中的「正統」之爭，是「當代君臣，自私本國」、「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sup>6)</sup>。就連儒家思想那套內聖外王的烏托邦理想，以及傳統儒學做為中國政治思想基礎的論述，在當代也被認為早在西漢時期儒學就已法家化了，「外儒內法」的思維下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並以「尊君卑臣」觀來強化法家皇權治術至上的實質意涵<sup>7)</sup>。由此看來，依附儒家聖王論的道統思想只是封建皇權合法性的點綴。對於孫中山而言，道統論在其投身革命、肇建共和的過程中，也只是一種面對朝代歷史循環的理想性的自我定位觀，並且避免產生因過激的民族主義與現代主義訴求所產生的「歷史斷裂」及其不當影響。

做為孫中山繼承者的蔣介石，自認繼承孫的革命遺志，也當然以五千年中華文化道統的接續者自居，並做為其政治思想的道德意識的核心。蔣介石雖為軍人出身，但對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並不排斥。在他和中共長期的抗爭中，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所以對於外來的共產主義無神論相當敵視。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以社會主義改造為目的而推動的極權統治，是以剷除傳統中國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為必要代價，這更讓蔣介石與國民黨想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捍衛者。另一方面，國民黨退守台灣，原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領土的主體性及其統治條件與現實脫節，為扭轉此一不對等的情勢並擴大政治宣傳效益，以反共為前提的道統論及其延續中華文化的正當性便成為其「中國正統」的精神代表。儘管如此，失去中國大陸的主控權以及台灣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被納入美國西太平洋防共線中的一個環節，以致蔣介石企圖以武力「反攻大陸」的可行性日趨幻滅<sup>8)</sup>。這也反映出精神形式上的反共道統論與自我彰顯的中華文化捍衛者的心理，都無法掩飾國民黨在

---

山樓管理所：<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9031&CtNode=1267&mp=13>，2011年8月25日。

<sup>5)</sup>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上冊，頁7-8。

<sup>6)</sup>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五種》，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55。

<sup>7)</sup>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32。

<sup>8)</sup> 1951年韓戰爆發，美軍介入台灣海峽，阻止兩岸互相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避免冷戰衝突擴大。1953年7月韓戰停火協議簽定前，台灣嘗試性發動對福建南部東山島的陸空兩棲反攻作戰，但以失敗收場。1954年底台方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1月中共隨即武力攻佔浙江外海的一江山，致使國民黨被迫放棄大陳島。自此蔣介石不再以武力反攻為唯一對中共的政治軍事目標，而逐漸採取武力保台的守勢戰略。

台灣「王業偏安」、且無法主動掌握國際形勢發展的政治現實。

國民黨的反共道統論及其政治宣傳中，對於中共批判孔子的態度格外注目。因為孔子與儒家思想是道統論的主軸脈絡，批孔就是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與背離，因而更加突顯馬列主義的外來性及其對中國的危害。雖然建政前，中共於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中把孔子到孫中山的歷史傳承視為珍貴的遺產，與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及古代中國文化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的必要條件」，以及1945年「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將中國古代文化進行「批判性接受，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等，可視為對於傳統文化仍採取保留、甚至是「去蕪存精」的現代觀。可是1949建政後，對於傳統文化代表性人物孔子，本質上還是視之為傳播馬列主義階級鬥爭論的主要障礙。但在形式上，文革前由官方主導下還分別於1957、1961、1962等三年召開全國性的孔子問題討論會，企圖對孔子當年的時代背景、他的「階級立場」、哲學與政治思想等進行全面的討論與歷史定位。這其中的觀點有視其為進步、革命的，當然也有列為反動的<sup>9)</sup>。這其中尊孔與反孔並存的意識現象，其實也只是反映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歷史的傳統性與脈絡性，如何藉孔子來找尋與當代共產革命結果產生必要接榫的政治正當性而已。對於中共本身而言，中國近代革命勢必與共黨意識形態框架中的民族主義互為表裡。對中國歷史的認知與傳統的道統意識，在當代其實是斷裂後的重構。而毛澤東是黨內路線鬥爭的唯一正確代表，他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對中共治下的知識份子而言，毛澤東是政治領袖，可以說代表治統，同時又是思想領袖，又可以說是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以來的「共產主義道統」，治統和道統合一，簡直可以說是實現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的聖君理念，而這種追求道統與治統合一的歷史心態，正是毛澤東個人崇拜能夠自延安時期以來不斷興盛的主要原因<sup>10)</sup>。在此前提下，以孔子、儒家學說為核心的道統觀自然會以「停格」的方式歸納在歷史的框架中接受定位與批判。所以當像文革這種擴天性的政治運動風暴來臨後，「批孔」自然會成為一種必要的政治風向與操弄手段。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等群眾運動以及破四舊等激進路線，並藉此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和文教宣傳機構中的黨官僚，孔子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精神與事物再次成為權力鬥爭下必除之而後快的犧牲品。1969年5月4日，中共的「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紀念五四運動五十週年的社論中，就直接點名「毛澤東思想」一詞的始作俑者、已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宣揚孔孟之道，「充分表現了他妄圖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和維護一切反動階級利益的反革命面目。」之後的數月間，《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繼續接力發文，直接攻擊劉少奇「與孔子妥協」、「為孔家店招魂」<sup>11)</sup>。但在文革後期，

9) 徐晴嵐，〈毛共「批孔揚秦」的背景與陰謀〉，收入：《共匪「批孔揚秦」的滔天罪行》，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1974，頁38-42。

10)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11-12、399-400。

11) 邊耀東，〈打不倒的「孔家店」〉，收入：《共匪「批孔揚秦」的滔天罪行》，頁27-28；《匪文革以後的

以及隨後爆發的林彪事件，藉孔子問題的文化批鬥更直接成為權力路線與清洗對手的策略方針。1973年中共「十大」前後所展開的「批孔揚秦」運動，以及1974年初毛澤東擴大為對林彪批鬥的「批林」運動，其先後對像是以林彪等政敵為核心，或藉以達到牽制周恩來（批周公）的策略。而「批林」與「批孔」結合，以及相關的指涉更是直接把政爭的矛頭指向周恩來，也就此暴露出江青等人在政爭過程中所顯現的「幫派體系」<sup>12)</sup>。由於「批林批孔」運動動員投入範圍很廣，影響社會層面巨大，因此很明顯地衝擊到整個大陸工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而群眾對於這一切因「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惡果極度不滿。1974年11月，著名的「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的大字報，也可視為對此不滿現象反彈中最為突出的一個表現<sup>13)</sup>。

對台灣而言，中共建政後推動社會主義改造與獨尊馬列主義進行思想清洗，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史無前例的斷送與斷喪。而文革及其群眾路線運動對「四舊」的打砸燒搶式的空前破壞行為，在國民黨的文宣與教育工作中常被形容為「罄竹難書」式的罪行。可是，從孔子思想與歷史定位之爭，到文革中直接把打倒「孔家店」、「孔老二」的批判式罪名，來當作清算政治異己的詆譏性效應，自然會讓自詡為中華文化捍衛者的國民黨找到政治與文化宣傳上的反擊點。不過，讓台灣當局認為文革中如火如荼的批孔運動已與其反共的道統論真正展開全面對決的關鍵，則是中共將批孔與「揚秦」—正面肯定秦始皇，來做為結合論述與鬥爭路線後的種種措施及其效應。因為在國民黨看來，文革等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各種亂象、災難與發展倒退都是「共匪暴政」，中共不但以批孔做為否定傳統文化的指標，還頌揚秦始皇的功績，這根本就是突顯毛澤東就是典型的「當代暴君」。這種暴政加暴君的極權統治形態，給道德意識上高舉尊儒的反共道統論，以及標榜「自由中國」的台灣，一時找到文化反攻與全球反共的制高點。例如，在國民黨的宣傳論述中，曾擔任過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的徐晴嵐就提及如何利用這的制高點來做為精神行動的準則：

我們不只是光大了民族文化的正統主流，對於諸子百家歷代賢哲的學說也是併存同光；我們有儒家的仁政，也有法治的精神……。我們大家要用這一切的精神力量與輝煌事業來與大陸上的同胞溝通心意，與大上一切不同意毛共「反孔揚秦」的知識份子結合成思想上的聯合戰線，與可能因此一運動被批、被鬥、被整的匪偽黨政軍人員及其他人士結合成政治上的聯合戰線，把「揚秦運動」轉變為「打倒紅色暴君運動」，把「反孔運動」轉變為「要求仁政」、「反對暴政」、「爭取人權運動」……以挽救大陸

---

宣傳工作》，行政院各部會局處敵情研究工作會報，1968年6月28日，頁2。

<sup>12)</sup> 例如1974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唐曉文的文章〈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麼〉，「孔丘擔任了魯國管理司法、刑獄的司寇，並代行宰相職務」，把孔子寫作「宰相儒」，從此江青一夥便開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來。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台北：百川書局，1989，下冊，頁530。

<sup>13)</sup>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頁552。

同胞免於陷入更大的一場災難<sup>14)</sup>。

然而，只靠黨內式的口號或宣傳論述還不能匯集成具體的行動。台灣當局面對文革批孔等的反傳統行徑及其破壞影響，所採取最有代表性的組織與政策的反制措施，則是開始推動一系列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成效與影響則值得關注。

### 三、文化反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定位與成效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上世紀70年代台灣政治與文化發展中的代表性政策。從發起過程看來，是很明顯針對文革爆發後所採取的對抗性策略。為紀念1966年11月12日為孫中山百歲晉一誕辰，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落成典禮。該會上蔣介石發文再次肯定國父孫中山繼承道統，發明三民主義，使五千年中華文化歷久彌新。會中決定每年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自此展開。經籌辦準備，1966年7月28日於台北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以做為運動推行之統籌機構，並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同時推舉蔣介石為會長。7月30日，國民黨頒布〈各級組織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辦法〉，以黨組織來配合執行相關細節。8月23日，蔣介石聘任孫科（孫中山之子）、王雲五、陳立夫三人為文復會副會長，錢穆、林語堂、孔德成（孔子後裔、世襲第32代衍聖公、祭孔奉祀官）、于斌（天主教樞機主教）、羅家倫等文教、宗教、政黨要人十八人為常務委員。自此，文復會的組織架構完備，成為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核心單位<sup>15)</sup>。

從成立的時間點與主旨看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大陸發動文革、破壞傳統文化的行徑息息相關。無論從民間（例如華僑）較為激進的反應，到學界較溫和性的論述，咸認為文革史無前例的破壞已使中華文化面臨危急存亡的關卡<sup>16)</sup>。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營造這一氛圍並形成廣大輿論，透過組織運作與海內外活動，讓中華民國成為搶救中華文化正統與道統的延續者，以擴大與中共抗爭的政治性訴求力量。不過，在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前，國民黨在台灣為配合其統治並強化反共思想教育，已展開近二十年以三民主義為核心思想的文化運動。在國民黨來台進行改造之初，

---

<sup>14)</sup> 徐晴嵐，〈毛共「批孔揚秦」的背景與陰謀〉，頁57。

<sup>15)</sup>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王壽南編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紀要》，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1981，頁5-10。有關文復會的成立背景、組織架構及其運作模式，請參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轉變》，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頁83-178。

<sup>16)</sup> 例如：高信，〈復興中華文化消滅共產邪說：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元旦獻詞〉，任卓宣，〈復興中華文化的三種方法〉，以及中央社，〈收焚古籍竄改歷史：共匪破壞中國文化〉，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論文集》，台北：僑務委員會，1967，頁71-18、79-86、103-104。

曾發表〈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提示各方面基本的政策方向，在「完成三民主義的民主政體中」，國民黨表示要發揚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明優點，維護學術思想與信仰自由。具體的做法，則為推展三民主義教育與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從文學、美術、音樂、戲劇、電影各方面，溝通全國人民的思想，集中其意志與力量」。做為改造後的第一個文化運動，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未在法規制度與社會上引起太大的改變，甚至還國民黨內部被評價為「貧弱與低能」<sup>17)</sup>。然而，這亦表明國民黨已注意到文化運動在「黨國改造」與反共抗俄政策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依據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構想與初步經驗，到文復會成立前，國民黨繼續推行以學校教育配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仿共青團）強化三民主義思想灌輸的文化改造運動，以「淨化」藝文工作與出版事業的文化清潔運動，以及針對軍中宣傳與帶動作戰抗敵氣勢的戰鬥文藝運動。這三個運動可視為中華民國政府在遷台的前二十年間，日益重視文化方面的動員工作，並將三民主義、擁戴領袖與反共復國等訴求不斷重覆宣傳，塑造大是大非的正確人生觀。同時，從文化清潔運動以來，國民黨形式上退居幕後，開始積極利用民間團體發起運動並塑造全面響應的模式，這後來也被文復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繼承，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在戒嚴體制下，操縱控制文化運動與輿論媒體的技巧也日益成熟<sup>18)</sup>。

就運動意義與目的而言，1966年開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不是全盤接納式的中國文化復古運動，而是以倫理、民主、科學為依歸的文化建設，並以三民主義做為實踐思想準則，來闡揚傳統優良文化。以設定運動方向的重要文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而言，在「基本精神」的部份，其前兩條即為：一、三民主義為中華文化優良傳統之結晶，加強實踐及貫徹三民主義，即為復興中華文化之康莊大道；二、依據總統昭示，倫理、民主、科學為三民主義之本質，復興中華文化應遵循此項解釋，加強政治社會與民生建設。而第五條則明確揭示該運動的政治目標為「討毛反共，即為保衛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之努力方向」<sup>19)</sup>。而做為該運動主要的推動執行單位文復會，依據該會組織章程第二條之規定，該會的任務為以下五點：

- 一、提倡民族文化之研究，創造並推行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之各項文化建設；
- 二、鼓勵各公私文化學術研究機構，從思想上、學術上，弘揚中華傳統優良文化；
- 三、協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增進民族智能，發揚民族道德，蔚為正義磅礴之民族人格；
- 四、推行國民生活須知，加強國民生活教育，並研訂文物典章禮俗制度；

<sup>17)</sup>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轉變》，頁48-49。

<sup>18)</sup> 同前註，頁80-81。

<sup>19)</sup>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1967年7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人暨成立大會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人暨成立大會議事錄》，1967年7月28日，頁7。其它部份並參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轉變》，頁131-133。

## 五、擴展大陸及海外討毛救國聯合陣線，根絕毛共匪幫摧殘中華固有文化之罪惡<sup>20)</sup>。

文復會以這五項任務為推動會務的具體內容及目標，很明顯是將學術文化、教育體制、生活禮俗與反共政治結合起來，來強化「復國建國」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與宣傳效益。在實際的執行面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組織與活動頗為詳細，且範圍包括台灣與海外，因此在這五項任務指標下其推動內容涵蓋面很廣。就文復會成立近十年以來自身所做的成果評述，除研訂推行計畫與各種規章外，該會的具體工作尚包括：建立國內外分支機構、發揚倫理·民主·科學精神、促進學術研究與出版、獎勵文藝研究促進文藝發展、促進教育改革、輔導國民生活、舉辦各種文化講座、振興國劇加強國劇研究與推行、歷史文物的蒐藏與運用、舉辦文化活動、舉辦文化復興工作績效觀摩會、舉辦有關文化復興之各種座談會、對共匪文化作戰、海外地區分會之文化活動等等，可說是繁簡兼有，涉獵甚廣。但整體看來，似乎多偏重宣傳性與推展組織的表象性事務，真正開創性的實務工作及成果似乎還是有限。像是整理古籍加以今註今釋有四十七種，至1977年已出版二十七種。同時還編撰中國歷代一百位思想家叢書，以及編輯中國科技史叢書十三種等，可視為較為具體的學術出版成果<sup>21)</sup>。就日後學者的研究看來，文復會的工作內容及其評價，可從以下三點來歸納：一、推展中華文化，兼具道統、主義與反共的精神性與政治性指標；二、履行理想的生活規範，確立國民生活須知的意涵與實踐內容；三、擴大海外文化戰爭，深化國際宣傳與僑界宣傳<sup>22)</sup>。從這三點與前述文復會自身所做的成果評述內容看來，大部份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還是以強化台灣內部的思想教育與反共的宣傳成效為主體，有些做法甚至還屬於配合性的被動措施。但海外文化戰爭及其宣傳則是相當積極與主動性的，其中尤其是爭取海外華僑受文革波及下對「自由中國」所產生的向心力，並藉機擴大打擊中共對僑務的統戰工作等內容<sup>23)</sup>，則較值得多加關注。

整體而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是中華民國反制文革的政治措施，但它在國民黨遷台之後所推動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與文化復振運動中，仍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並發揮一定的功能。相較於文革的全面性文化破壞，以及中共高層藉批孔等負面的群眾運動來達到打擊政敵的目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讓反共的道統論找到在台灣得以延續的正當性，並藉此擴大海內外與中共的抗爭情勢，以收攬人心，鞏固統治基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還與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等新興重要政策相配合，加上自1960年代末開始的

---

<sup>20)</sup>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實踐與展望》，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二次編印，1977，頁3。

<sup>21)</sup> 同前註，頁1。

<sup>22)</sup>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轉變》，頁131-178。

<sup>23)</sup> 僑務委員會敵情研究室編，《毛匪發動文革與匪偽僑務工作》，台北：僑務委員會敵情研究室，1969，頁19-27。

產業轉型與經濟起飛效應逐漸顯現，都使得台灣在面對中國大陸「文革浩劫」的關鍵時期，能以重建復興中國文化的責任者自居，並將穩定的社會進步發展視為達到攘外安內的先決條件，以提昇海峽兩岸政治軍事對抗中的精神地位與相關效益。從這一點看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確有其值得肯定之處。

不過，雖然國民黨在反共道統論的基礎上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現代民主國家展現其文明建設觀的嘗試，但其「寓文化力量於政治」的初衷，以及黨政運作下激化民主自由對抗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的對立，都讓這種文化復興的內涵不是受限於「忠君愛國」式的偏執主觀性，就是陷入「與匪鬥爭」式的抗爭對立性。這讓該運動過度強調定型式的崇高理想，與欠缺整體復興中華文化在兩岸不對等的環境中所能展現的實際效應，同時也明顯缺乏思想活絡下具有深度意義的啟蒙性功能。然而，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成效的最大罩門，則在於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及其運作的文化運動畢竟擺脫不了政治的現實。文革後期，台灣在國際政治環境中面對中共的壓力下出現一連串的外交挫敗。這不僅使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角色與任務，開始轉向於對中華民國救亡圖存的努力，同時也引發出台灣日後民族主義走向與國家認同複雜化的另類發展局面。

#### 四、從文化祖國觀的定論、脆化到本土化意識的轉型：國族主義的新戰線

1949年國民黨撤守台灣之初，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十分危急，後因韓戰爆發以及美國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成為美國西太平洋反共圍堵陣線的盟邦後，原本孤立的情況才漸趨舒緩。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無論在幅員、人口與國際影響等方面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差懸殊；且蔣介石自居法統中國的承繼者，在國際上也反對一切「兩個中國」的承認模式，因此除政治與軍事的抗爭外，他和國民黨不斷鼓吹反共的道統論，其目的就是要把台灣這個「復興基地」當成中國文化的母體。而文革的出現契機以及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是為鞏固這個替政治目的背書的文化祖國觀。尤其當文革所帶來的破壞日益嚴重，中共高層的鬥爭更加劇烈之際，做為中華民國主權與法統意識表徵的文化祖國觀，自然會成為一廂情願式的自我吹捧的政治解讀。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文革進行最為激烈之際，冷戰的極端對壘與中蘇共反日後的詭譎情勢，卻使得中共在國際間對於中華民國的外交打壓大有進展。從1971年4月9日美國不尋常地宣布將於1972年將釣魚台（或稱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交還日本（日方稱尖閣群島），引發台灣的強烈抗議，隨後在海內外開始引發日後在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爭議極大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運動）。蔣介石於6月15日在國家安全會議上發表〈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昭示全國軍民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慎謀能斷，以應付風雲萬變之國際情勢」<sup>24)</sup>。而之後這「莊敬自強」便成為台灣政治宣傳中的新興概念，包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內的許多措施都以其為論述與推動之重點。從釣魚台問題上，可以看出美國對於海峽兩岸問題嘗試尋找突破口的企圖。果然不久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突然宣布將於來年5月前訪問中國大陸，並於1972年初成行。1972年2月28日美國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雖然其目的要孤立蘇聯及其盟邦，並加促美軍撤軍越南，但其對解決兩岸爭議與「一個中國」的曖昧態度，無形中已對中華民國自稱代表中國唯一法統的立場展現不支持的意圖。然而，這段時間前後對於台灣外交衝擊最大的事件，則是1971年10月25日因阿爾巴尼亞在聯合國提案通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原有的席次（屬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代表團抗議退席，宣佈退出聯合國。這無疑是國民政府遷台二十年來最大的外交挫敗。自此之後則接續出現1972年初〈上海公報〉事件，以及同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正式建交，台灣隨即與日本斷交的另一波衝擊。

面對這一連串的外在挑戰，台灣當局對內的首要任務則是須全力安撫人心，擴大政治宣傳的力度。而文復會立即將之前已展開的「莊敬自強」宣傳轉變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動主旨：一方面積極闡述文化復興與「莊敬自強」的關聯性<sup>25)</sup>，另一方面則從原有教育、文宣、藝文等已進行文化復興的運作中，把「莊敬自強」當作「中華文化的精華」，並視為新的反共復國政策的心理支柱，同時要從激勵民心、安定社會、與建設地方等三方面入手，以結合「文化復興運動再推進」工作，擴大實施<sup>26)</sup>。而這個「莊敬自強運動」的核心思想與行動準則，是以前述蔣介石於國家安全會議上發表〈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一文為依歸。嚴格說來，這種從上到下的訓令式運動，仍流於口號式的精神動員與僵化的鞏固領導中心的政治意圖，其目的則是要人民在「莊敬自強」之際要真正做到「處變不驚」，讓「國際逆流」不要影響人民對國民黨有能力安定局勢的信心。

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到「莊敬自強運動」，由於外交困境加深，使得台灣當局所強調的反中共、抗文革與立足於國際變局以應變的政治資源日益困窘，這更讓文化復國的反共道統論，以及台灣做為中國文化祖國觀的論述，形式上益顯重要，但實質上卻展現其脆化與不切實際感。前文已提及，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及其運作的文化運動畢竟擺脫不了政治的現實。但真正的危機，則是這種原本要來做為「固本培元」式的文化重建與精神動員，反而讓做為國家認同主軸的民族主義觀瀰漫在思想與實踐落差的虛無性中。中華民國在台灣要做為中國政治法統的所在地，同時也要成為「五千年優

<sup>24)</sup>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編，《實踐「莊敬自強」重要論述》，中興新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1972，頁1。

<sup>25)</sup> 谷鳳翔，〈文化復興與「莊敬自強」之例證〉，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編，《實踐「莊敬自強」重要論述》，頁4-10。

<sup>26)</sup> 〈台灣省各界實踐「莊敬自強」工作要點〉，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編，《實踐「莊敬自強」重要論述》，頁59。

良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越是高唱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但中共所控制的實體中國則成為國民黨思想箝制體制下的絕對禁區。在戒嚴體制下，台灣民眾是不能隨意去接觸任何有關中國大陸的事務，凡提及當代中國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相關部份必須被隱匿，否則動輒會以「為匪宣傳」論處。中國大陸所有的信息、研究成果也都被情治單位、對陸工作的黨政機構或特定的學術智庫（如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視為「情資」而被把持。換言之，中共控制的中國不但不能正視，數億人口的政權被虛擬化，且在反共與「仇匪」的政策下，台灣民眾被教育成將之視為當代暴政的代表，且必須推翻之並以解救鐵幕中廣大的「苦難同胞」為最高使命。在這種極端的文宣教育策略下，不但要把中華民國型塑成中國道統延續者與中國文化的祖國，同時也要撻伐文革所帶來的空前破壞。事實上，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確實有其立意良善、端正民俗的積極面與效益性。但這種與一般國族主義的文化實體性論述，或者如 Anthony Smith 所論及的國族主義中的民族象徵性（ethno symbolism）<sup>27</sup> 無法充份結合與創新的文化復振現象，讓中華文化在台灣發揚光大的企圖心即使有其崇高與理想的一面，但現實中大部份「已淪陷」的民族文化母體無法與之結合互動的前提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延續、展現或搶救下的中華文化，仿佛是失了根的蘭花；或是好比擁有優質的種子，但只能將其撒在不相襯的土壤中，無法真正生根，所以也無法成長茁壯。

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於當代台灣國族主義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則是在中國政治與文化正統觀之下，台灣本土文化及其自覺意識被明顯制約與壓抑。即使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在地以閩、粵兩地漢人為主的移墾社會仍具有一定的「華人性」（Chineseness），或者可以視為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東南區位。而在 1949 年隨著國民黨遷台的大陸各省移民來到後，這種「華人性」更顯得多元。也因此，在冷戰時期，西方社會大多視台灣為一個「微型中國」的概念，並成為新興行為科學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可是在以達到反共復國政治目標為前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台灣的地方文化最多只是中華文化母體中的一個組成單元，其「省級」的地方性及其內涵也只能是國家幅員中的一塊拼圖。遺憾的是，國民黨精英在抑制偏安思維、強化中國正統意識的心態下，將台灣的本土文化當成附屬之餘，還擔心「深度不夠」的本土文化會影響「優良中華傳統文化」的推動，因此必須防制以局限其發展。這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政策，就是全面推動國語運動，以打壓閩南語、客語等方言以及南島系原住民族語的使用情境<sup>28</sup>。事實上，自 1950 年代初就開始進行的國語運動，就國家發展

<sup>27</sup> Anthony Smith 界定民族象徵論的定義時，特別強調國族論述中的歷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nations）、族群意涵中的象徵性要素（symbolic elements of ethnicity）、以及國族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ation）及其與歷史意識建構的關係等。參看：Anthony D. Smith,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3-41.

<sup>28</sup>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構與轉變》，頁 136-142。

的現代性建設而言，其促進不同背景的人際溝通功能未必全是負面性的。但其推動過程與心態所反射的改革者的文化優越性與被改革者的文化落後性的反差，以及國語（官話）做為反共道論的重要文化展現與表徵，這在其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過程中，更是成為官方文化意識形態的代表。事實上，這種因文化復興運動及其相關措施而遭扁抑的本土文化意識，在之後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中反而重新被賦予帶有反抗性的新國族主義情結。尤其當台灣民間的民主運動以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為訴求，之後形成以本土（本省人）屬性為特色的族群動員後，這種以台灣本土文化重生來對抗外來官定中華文化的新國族主義情結，更擴大為對抗當代中國（中共）的台灣主體性思想的重要依據。自1970年代以迄今台灣的國際空間持續被壓縮，台灣主體性思想更形成不同形態的台灣獨立運動，其「反中仇中」意識明顯成為其政治訴求的神主牌。但中華民國自1950年代以來的反共政策就不斷灌輸台灣人「仇匪恨匪」的政治意識。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類的文化思想動員並未減緩此一對立性，反而藉由高談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以及壓抑台灣本土文化，來企圖穩固這種提高對立仇視的正當性。而這種自我建構的對立仇視的正當性，並未因其後台灣的民主化以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的新形勢轉變而有所根除的可能。實質上這只是把1950年代以來國民黨的反共仇共政策，借屍還魂到當今台獨運動的反中（包括中國文化）保台（肯定切割中國的台灣文化）論述中而已。這種「寓政治於文化」下重建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操作，彷彿是另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台灣本土運動版。這對於當年盡心設計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前人而言，可能是始料未及的！

此外，因文革以及1970年代保釣愛國運動的影響，台灣內部也出現激發左翼思潮與保守右派勢力的鬥爭<sup>29)</sup>，以及海外保釣愛國運動連帶影響海外年輕中國人重新尋求轉向中國大陸「祖國認同」的回歸熱潮。這種內外夾擊形式的出現，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其卻顯得被動與冷漠，顯見其投鼠忌器的心態。尤其是海外保釣愛國運動引發激情式的祖國回歸情結，以及激進性的國族主義認同傾向，正突顯出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過於高調性與灌輸性的文化重建觀，未必能充份滿足海外年輕人實質的祖國意識與強國主義下的民族文化觀。另一方面，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意味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功能與時代任務也要開始有所轉變。1990年12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簡稱文化總會）。1991年3月28日，該會奉准立案成為社團法人性質的民間團體，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兼任會長。2006年12月19日，值陳水扁主政時期，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名為「國家文化總會」。2010年12月30日，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國家文化總會更名為「中華文化總會」以迄今。

---

<sup>29)</sup> 這方面當事人的心路歷程，可參看：陳映真，〈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2005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文集（政右經左版）》，<http://blog.yam.com/philosopher100/article/5657138>，2006年1月30日。

## 五、結論

1970年代中期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可以視為中華民國政府面對中國大陸發動文革，及其帶來的空前性文化破壞所做的最有代表性的反制措施。雖然國民黨是以反共的道統論、中國文化祖國以及中華文化捍衛者的自我立場為基礎來推行該運動，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現代民主國家展現其文明建設觀的嘗試。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本質上「寓文化力量於政治」的基本理念，以及藉由黨政運作和教育宣傳下，來激化民主自由對抗共產極權意識形態的對立性，都讓這種文化復興的內涵不是受限於「忠君愛國」式的偏執主觀性，就是陷入「與匪鬥爭」抗爭式的敵我觀。尤其在1970年代初，台灣面對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後，將「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思想意識與正在推動的文化復振措施結合，這都讓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過度強調定型式的崇高理想，以致欠缺整體復興中華文化在兩岸不對等的環境中所能展現的實際效應。

整體而言，理念崇高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動成效畢竟受限於其特殊的時代格局。從文明觀與現代性看來，過於依附於黨政體制及其政治意識形態運作的文化運動，終究擺脫不了無法自我突破國際政治困境下的現實反彈，這對於鞏固國民黨反共統治的實質效益，很難提供出立即且具備「撥亂反正」意義的使力點。就本質而言，在戒嚴體制、管控思想的大環境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明顯缺乏思想活絡下具有深度意義的啟蒙性功能，因此只能成為依附在政治目標下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自我保衛運動。另一方面，因為該運動推動同時明顯壓制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與定位，所以便使得日後台灣內部的國族主義走向與國家認同觀，在民主化及其本土族群動員的推波助瀾下，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相關的文化政策，視為國民黨削弱台灣主體文化意識的推力。但在內涵上，台獨運動卻承襲了國民黨在冷戰中強力灌輸的「仇共」意識，使之轉化為當代「反中」思想下的精神依歸。甚至在重建台灣本土文化意識及其正當性、並嘗試與中國文化切割的實踐中，彷彿還能感受到當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某種模式與灌輸形式，只是主客易位，「台灣」取代了「中華」而已。這種擺盪在「保中」與「去中」的思想對立，已成為21世紀台灣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發展的主軸訴求與攻防點。回顧此一形勢的發軔與延續，不得不讓人重新檢視文革對台灣的衝擊與影響，其程度可能超過之前的觀察與定論。這一點，是值得讓關心兩岸問題的人繼續反思和檢討的。